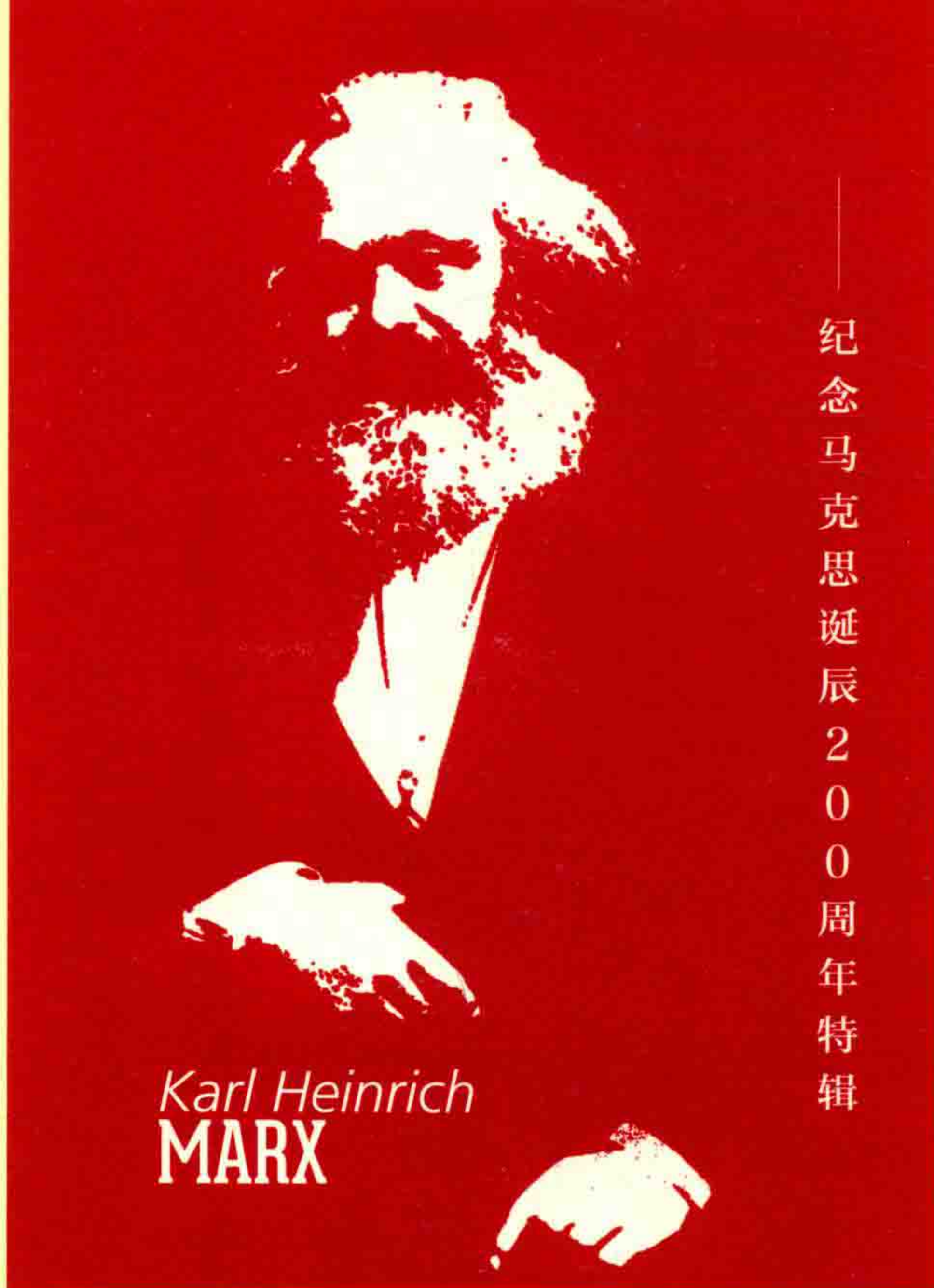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研究文丛

建构中国 马克思学

鲁克俭◎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非外借

马克思主义研究文丛

建构中国 马克思学

鲁克俭◎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建构中国马克思学 / 鲁克俭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7-5117-3575-1

- I. ①建…
- II. ①鲁…
- III. 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 IV. ①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16520 号

建构中国马克思学

总 策 划
出 版 人: 葛海彦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杜永明
美术编辑: 王洪广 吴成英
责任印制: 刘 慧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39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46 (馆配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15 千字
印 张: 21.25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6.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5626985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55626985

五月五



代序：以方法论自觉建构中国马克思学^①

近年来，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在国内学界越来越受重视，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日渐式微的情况下，它大有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新的生长点之势。为了推动这一研究的深化，本书结合我们在做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过程中的一些体会，谈一下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以期引起同行专家和研究者的重视。

“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尽管是一个新提法，但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本身并不是什么新事物，因为一直以来人们所做的马克思研究就是文本解读研究。“文本”是一个解释学的概念。就马克思的“文本”来说，除了马克思本人，其他人在面对这些文本时，也就是在进行“解读”。“读书”，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生存状态。马克思的研究者也是在“读书”，是“读者”。但马克思研究者不同于一般的“读者”，因为研究者的“读”是带有研究性质的。这就是说，一方面，研究者的“读”要比一般“读者”读得深，能读出更多的东西；另一方面，研究者的“读”是有学术积累的，后来的研究者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进一步“解读”。而如何深化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也是每个研究者都会自觉思考的问题。

在我们看来，要进一步深化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研究者至少应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方法论自觉。

^① 首次发表于《光明日报》2007年4月10日“理论周刊”，原标题是“方法论自觉与学派建构”，是笔谈“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文本学派”的其中一篇。在由《光明日报》理论部和《学术月刊》编辑部评选的2007年十大学术热点中，“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研究与‘中国马克思学’问题”位列第五个热点，该热点的第一个“相关链接”就是这组学术笔谈。

第一，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要基于 MEGA²。研究者不同于一般的“读者”，他并不是孤立地面对文本进行解读，而是要尽可能地利用相关的有价值的材料。研究者依据已有材料做出的解读结论，在新材料出现后，其可信度就要经受检验。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有一些既有解读结论被新材料所“证伪”，或者其可信度大打折扣。而这也是一个学术积累和进步的过程。就中国的马克思研究者来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只有少数马克思著作被译成中文，到 20 世纪 80 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 50 卷全部出齐，研究者可资利用的材料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的深度也大大提高了。不少老一辈马克思研究者熟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 卷，对马克思文本所做的解读研究达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极致。新一代马克思研究者要想超越前辈，就必须利用新材料，特别是 MEGA²。

尽可能利用已有的材料，是对研究者的基本要求。利用新材料，才能做出新结论。一些西方马克思研究者甚至专程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查阅马克思手稿，从而做出了新的发现。比较著名的例子就是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德在“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整理出并最终出版了《马克思民族学笔记》。中国学者一般没有条件这么做，但利用好 MEGA² 却是新一代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者的当务之急。在 MEGA² 新材料不断发表的情况下，我们如果仍然局限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 卷，就会在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中落伍。特别应该引以重视的问题是，不去有意识地利用新材料，就会给思辨留下发挥的空间，就容易出现“过度解读”的情况。阿尔都塞的“断裂说”可以说是“过度解读”的典型。尽管阿尔都塞在解读中运用了著名的“症候阅读”法，但他提出“断裂说”所依据的马克思文本材料是很有限的。阿尔都塞晚年精神病发作后曾坦白说，自己并没有读多少马克思的著作。阿尔都塞无疑是天才的思想家，其“断裂说”不乏真知灼见，但“断裂说”毕竟是缺乏充分文本依据的“过度解读”。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西方马克思学者指出它与马克思文本证据的矛盾之处。就中国学者来说，如果不在充分占有和利用新材料上下工夫，而是期望靠丰富的想象力和强有力的思辨做出阿尔都塞式的“新发现”，就很容易陷入

过度解读的泥潭。

第二，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要建立在充分了解国外马克思学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连国内理工科研究生都知道，阅读国外相关文献是做研究的前提。但对做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的国内学者（更不用说研究生了）来说，不了解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而径直做“解读”，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做研究首先要阅读已有文献，这是每个研究者都知道的道理。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内马克思研究者更多只是阅读中文文献（或者译成中文的国外著作和论文），而没有直接阅读外文文献的习惯和动力。正因为如此，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马克思研究基本上仍处于与国外研究相隔绝的状态，国内学者既缺少与国外学者的对话，也感受不到与国外研究的差距。

就国内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所探讨的“问题”来看，有三类问题比较常见。第一类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假问题。这些问题类似于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关于一个针尖上能站五个天使或六个天使的讨论，讨论尽管热烈，甚至引经据典，但没有多少学术价值。第二类问题是拿来国外学者曾经或正在讨论的热点问题，如人道主义、异化、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等。国内学者对国外学者的这些研究虽有所了解，但常常是略知一二，或知之不详。于是在围绕这些问题做研究时，常常是花了很大气力并自认为得出了新结论，但其实只是重复（甚至低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从某种意义上是做了低水平的重复性劳动。第三类问题是貌似新问题，实际上仍然是国外学者已经探讨过的问题。能够提出新问题，应该说是学术进步的标志。但在没有阅读外文文献的情况下，常常会出现自认为提出了新问题，实际上早已有国外学者做过深入探讨了。

毫无疑问，国内的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不能总是跟在国外学者后面，新一代学者有责任为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文本学派（即“中国马克思学”）而努力。但“创新”首先要建立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无视已有的研究成果而奢谈“创新”，是不可能成功的。

第三，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要以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新成果为基础。在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的历史上，新材料的出现（特别是马克思生前没有

发表的著作手稿在 20 世纪相继发表) 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的认识; 另一方面, 马克思版本专家在版本考证方面所取得的新成果也影响到既有的解读结论。比如, 一些曾经被认为是马克思著作的文本后来被判定为别人(如费尔巴哈、赫斯、恩格斯等) 的作品, 这势必会改变以往的某些定论。尤其是伴随着 MEGA² 的编辑出版, 马克思一些著作的版本问题(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文本的修改情况、文本各部分的编排问题、文本写作时间的确定、文本的作者身份、文本与其他相关文本的关系等) 进一步得到澄清, 将极大地深化人们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和经济学等基本思想以及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的把握和认识。MEGA² 各卷的编辑者关于相关文本所做的版本考证在各卷的资料卷中有详尽的说明, 因此利用好 MEGA² 资料卷是深化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的重要一环。在研究过程中, 如果研究者的解读结论与文献学研究的新成果相矛盾, 研究者就应该正视这种矛盾, 要么调整自己的解读结论, 要么做进一步的文献学研究, 从而否定 MEGA² 编辑者的研究结论。这才是真正严肃的中国学者对待国际马克思文献学研究成果应有的科学态度。在没有做任何进一步文献学研究的基础上(在这方面, 日本学者体现了真正科学的理性态度, 值得我们学习), 单凭自以为是的所谓“思想”(实则是过度解读) 就宣布前苏联文献学家及 MEGA² 编辑者文献学研究成果是“标新立异”, 恰似挑战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民间科学家”心态。如果进一步把 MEGA² 编辑者的文献学研究成果归入“西方马克思学”范畴, 更是缺乏基本学术常识的体现。总之, 无视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新成果都不利于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的深化, 也很容易导致对文本的过度解读。

第四, 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要善于参照主要语种的马克思著作版本。对中国的马克思研究者来说, 利用马克思著作的既有中文译本是一个便捷的途径。但为了解读的准确性, 研究者有时需要对照马克思的原文, 必要时还需对照各主要语种的马克思著作版本。马克思有些话也许参看原文也无法准确理解, 但参照其他语种的版本可能就迎刃而解了。各主要语种的翻译者大都是马克思研究的专家, 翻译本身就渗透了他们对马克思文本的理解, 因此参照主要语种的马克思著作版本, 实际上也是借鉴前人的智

慧，这与主动了解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新成果是同样的道理。

总之，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应该少些思辨，多些实证。康德在讨论科学时曾说，要给思想的翅膀挂上重物，使它不能任意翱翔。我们以为这一警告很适合当前的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如果说康德所说的重物指的是“经验”的话，那么我们所说的重物就是“实证材料”。只有这样，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才会有学术积累和进步，与国外学者的对话才有可能真正展开。

有人可能会认为“解读”是自由的，不应该有什么规则或方法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这里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澄清。

“解读”当然可以有不同的进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六经注我”式的解读与“我注六经”式的解读具有同样的合法性。“我注六经”式的解读是学术性的解读，用卡弗的话说就是“解释也是翻译”。既然是翻译，首先要忠实于原文，译者不能随意发挥。尽管不同译者的翻译不会完全相同，但其出发点却是准确地翻译原文。从解释学的角度看，解读者必然带有“合法的先见”，解读的过程也是读者与著作“视界融合”的过程。因而就会出现读者与作者的“对话”。但这种“对话”是作为解读的结果而出现的，而不应该是读者有意而为之。明确带着“对话”的动机去解读，应该属于“六经注我”式的解读。

“六经注我”式的解读是以读者为中心，或者用后结构主义的话说就是“作者死了”，读者可以自由解读。这种解读方式不求对作者的思想有完整准确的把握，而求从作者那里寻找能给自己以启发的思想材料，并经过自己的加工改造而形成新的思想。比如马克思读斯密的著作，并非想成为研究斯密的专家，而是想吸收和改造其有价值的思想成分。我们在读马克思的著作时，也面临两种角色的选择：是想成为马克思研究专家，或是只想从马克思那里寻求构建自己理论的思想资源？我们本书中所说的马克思文本解读，后面有“研究”两个字，是指以研究作者（即马克思）为指向的学术性解读；所说的方法论，也是文本解读“研究”的方法论。非研究性的解读不属本书讨论的范围，当然也不必受本书所提出的方法论的约束。

目 录

CONTENTS

上 篇

国外马克思学研究

第一章	国外马克思学概况及对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启示	3
第二章	国外马克思学译介与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深化	21
第三章	从马克思研究到马克思学	28
第四章	“西方马克思学”在中国	34
第五章	近年来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思想史梳理	55
第六章	马克思思想的德国古典哲学来源	72

中 篇

马克思文献学研究

第七章	新出版的 MEGA ² /IV/5 概况及其学术价值	91
第八章	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排序问题	113
第九章	再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身份问题	121

下 篇

马克思思想和文本解读研究

第十章 马克思《博士论文》与恩格斯《谢林和启示》之比较 137

第十一章 试论马克思对黑格尔逻辑学的创造性转化
——以马克思《博士论文》为例 155

第十二章 唯物史观“历史性”观念的引入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概念新解 ... 167

第十三章 基于MEGA²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文本研究：
一个路线图 188

第十四章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历史目的论 205

第十五章 超越传统主客二分
——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一种解读 225

第十六章 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理解之差异 247

第十七章 《大纲》与《序言》在唯物史观方面有矛盾吗？ 262

第十八章 再论马克思《序言》中的溯因解释 269

第十九章 “古典古代”等于“奴隶社会”吗？
——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古代生产方式” 282

第二十章 重新审视“发展命题” 293

索 引 301

后 记 327

第一章 国外马克思学概况及 对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启示^①

一、马克思学的含义

在介绍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状况之前，首先需要对“马克思学”这个词的含义作一番考察。根据曾枝盛教授的说法，梁赞诺夫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使用了“马克思学”这个词（应该是俄语）。^②“Marxologie”这个法语词（它对应的英语词是Marxology）是由吕贝尔最先造出来的。“Marxologie”从构词法来看就是“Marx（马克思）+ ologie（学）”，即研究马克思的学问，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红学”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鲁学”是研究鲁迅的学问一样。“马克思学”这个词广为人知应该归功于吕贝尔创办的学术刊物《马克思学研究》（1959年）。吕贝尔认为“马克思学”是对德国学术期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10—1930年）^③和

① 首次发表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马克思学研究”栏目。

② 参见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编：《马克思主义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9页。

③ 其出版人是法兰克福大学的卡尔·格律恩贝尔格教授（他还是1923年成立的法兰克福研究所的首任所长）。《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上发表过格律恩贝尔格论马克思中学毕业论文的文章，恩斯特·科佐贝尔论述共产主义者同盟历史的文章，梁赞诺夫纪念《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文章，霍克海默同曼海姆的论战（围绕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以及其对马克思意识形态观的反思（参见鲁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版的编辑史》，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6年第3期）。

MEGA 奠基人梁赞诺夫马克思研究传统的继承，因此在《马克思学研究》上发表的论文大多以马克思文献学研究为基础，特别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编辑与考证。^①但吕贝尔并非只为考证而考证，而是注重在严谨考证基础上得出新结论。

从《马克思学研究》1959年创刊到1970年，应该说吕贝尔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学家相安无事，而且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吕贝尔与苏联学者还有直接的学术交流。苏联学者也接受“马克思学”的概念，如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1969年编写的《伟大的遗产》一书就多次使用了“马克思学”、“马克思学研究中心”、“苏联马克思学”等概念。^②但后来发生了一个学术事件，导致苏联开始对以吕贝尔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学”的批判。1970年5月联邦德国（简称“西德”）的乌培塔尔市组织召开纪念恩格斯诞辰150周年国际研讨会，吕贝尔应邀参加会议并提交论文《关于“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论题的几点看法》^③。当吕贝尔到达乌培塔尔后，会议组织者告诉他说，来自苏联和民主德国（简称“东德”）的与会学者在读了他的论文后觉得受到了冒犯，威胁说如果吕贝尔不撤回自己的论文他们就退出会议。后来经过艰苦谈判达成了妥协，吕贝尔的论文不在讲台上宣读，而只供评论和讨论。这篇论文也没有被收入研讨会的论文集，于是吕贝尔就以《“马克思传奇”，或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为题把它发表在《马克思学研究》第15辑（1972年）。

自这起事件之后，在苏联学术界就出现了对“西方马克思学”的系统批判，并把“西方马克思学”进一步细分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学”和“小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学”。实际上，苏联学者这时所批判的“西方马克思学”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以深入的版本考证和文献学研究为特征的“马克思学”，而是涵盖了所有“居心叵测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马克思研究。按照这一标准，保尔·巴尔特早在1890年出版的《黑格尔和包括马

① 此外还发表对马克思文本进行解读研究以及历史方面的论文。

② 参见王东：《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

③ 国内通常把这篇论文的题目译为《反思格斯宣言》。

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史》试图制造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对立，就应该被列入西方马克思学著作的行列；而美国的悉尼·胡克则以其《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1933年）、《从黑格尔到马克思：马克思思想发展研究》（1936年）和《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1940年）成为20世纪上半叶西方马克思学家的代表。

西方学术界对“马克思学”的理解也逐渐宽泛起来。从1981年英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百科全书辞典》对“马克思学”的定义“马克思学是对卡尔·马克思著作中的理论、概念、策略和主张的系统研究”来看，西方学者也没有把“马克思学”局限在吕贝尔对“马克思学”的狭义规定上（即马克思学是对《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和梁赞诺夫马克思研究传统的继承）。这样，马克思学研究就不仅仅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的现象，而是可以回溯到20世纪初甚至19世纪末。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学”含义的界定与苏联学者对“西方马克思学”的理解基本上是一致的，当然除了一点：西方学者是在中性上使用“马克思学”一词，而苏联学者则从贬义上界定“西方马克思学”的含义。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苏联学者就把“马克思学”看作贬义词呢？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苏联学者并没有放弃在中性意义上使用“马克思学”，比如：80年代^①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仍然有《马克思学学术通报和文献》的出版物；博尔迪烈夫在发表于苏联《经济科学》杂志1982年第5期的文章中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的出版说成是“最近时期苏联马克思学的重大成就”^②；1986年韦利昌斯卡娅在“恩格斯在中学时代对古希腊历史和文学的研究”一文中考察了MEGA²第4部分第1卷新收的恩格斯两本关于古代历史和文学的中学笔记，并指出：“对马克思学者来说，首次用原文全文发表这些文献，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因为这些文献

^① 指20世纪80年代。

^② 参见博尔迪烈夫著、沈渊译：“马克思学的新成就”，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3年第3辑。

包含了恩格斯世界观形成的初期阶段的材料。”^①但苏联学者显然是在偏重版本考证和文献学研究的意义上使用“马克思学”一词的，这倒与吕贝尔倡导“马克思学”的初衷相吻合。其实这也不奇怪，因为吕贝尔本来就把“马克思学”看作是对梁赞诺夫马克思研究传统的继承，只不过在吕贝尔看来，梁赞诺夫的“精神”（即以真正科学的态度来研究马克思）在苏联已经失传了；苏联学者当然否认这一点，并反过来批判吕贝尔的马克思学研究貌似客观，实则带有很强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偏见。尽管如此，双方对“马克思学”这个词本身的理解应该说是一致的。

因此，在苏联学者那里，“西方马克思学”是一个贬义词，而“马克思学”是中性词，两者是有明显区分的。把“西方马克思学”与“马克思学”画等号，并把“马克思学”看作是贬义词，实际上是中国学者自己的误解。由于这种误解并以讹传讹，长期以来中国学者甚至到了对“马克思学”谈虎色变的程度。现在到了还其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二、国外马克思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长期以来国内学者没有明确把国外马克思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而是笼而统之地称之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叶卫平教授在《西方“马克思学”研究》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学”做了四点区分^②：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抛弃“马克思主义者”这个称谓，而“西方马克思学者”一般不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潮，而“西方马克思学”既包括小资产阶级马克思学，也包括资产阶级马克思学。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围包括了列宁主义的内容，而马克思学是与列宁学有区别的。第四，“西方马克思主义”属于社会政治思潮，它的主要注意力不在于研究马克

^① 参见韦利昌斯卡娅著、李锁贵译、明尹校：《恩格斯在中学时代对古希腊历史和文学的研究》，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89年第1期。

^② 参见叶卫平：《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